



No.C2016013

2016-11-07

## 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sup>1</sup>

林毅夫

摘要

华盛顿共识改革导致了许多转型经济体经济的崩溃、停滞，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 80-90 年代的“失去的二十年”。本文用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解释其失败的原因。华盛顿共识改革未能认识到转型经济体中的许多企业由于所在的产业违背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他们的生存有赖于来自于政府各种干预和扭曲手段所形成的保护和补贴。华盛顿共识建议政府将改革集中在产权、公司治理、政府干预和其它可能阻碍企业正常管理等相关问题上。如果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种改革将会导致企业的倒闭和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意外滑坡和停滞。本文表明，在分析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应该予以放松。

JEL 分类: L5, O1, P5

---

<sup>1</sup> 英文原文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宣读于 2013 年 6 月 25-26 日在英国伦敦大学 (UCL) 斯拉夫和东欧研究院举办的“转型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碰撞”国际研讨会，并发表于《经济政策改革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第 18 卷第 2 期 (2014) “转型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碰撞”会议专刊，第 96-113 页。中文稿由汤学敏翻译。

## 一、导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提高经济绩效，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图 1 显示，这种转型从一开始就为中国和越南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下简称 FSUEE）开始的转型则导致了其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和社会发展中诸多方面的恶化（世界银行，2002 年；Dell’Anno 和 Villa，2013）。2006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对 29 个国家（包括东欧和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国家联合体和蒙古）的 29000 人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 30% 的人认为他们生活水平比 1989 年高（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7 年）。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转型指标，FSUEE 的许多转型经济体已经“卡住于转型”（stuck in transition）：价格自由化，大规模私有化以及贸易和外汇市场的开放等大多数目标已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完成。然而，经济改革在治理、企业重组和竞争政策等领域却有所放缓，其速度大大低于其他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标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13）。在同一时期，世界其它地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建议：减少政府干预和加强市场的作用。然而，结果也是令人失望的。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恶化（Barro，1998 年）。Easterly（2001）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失去的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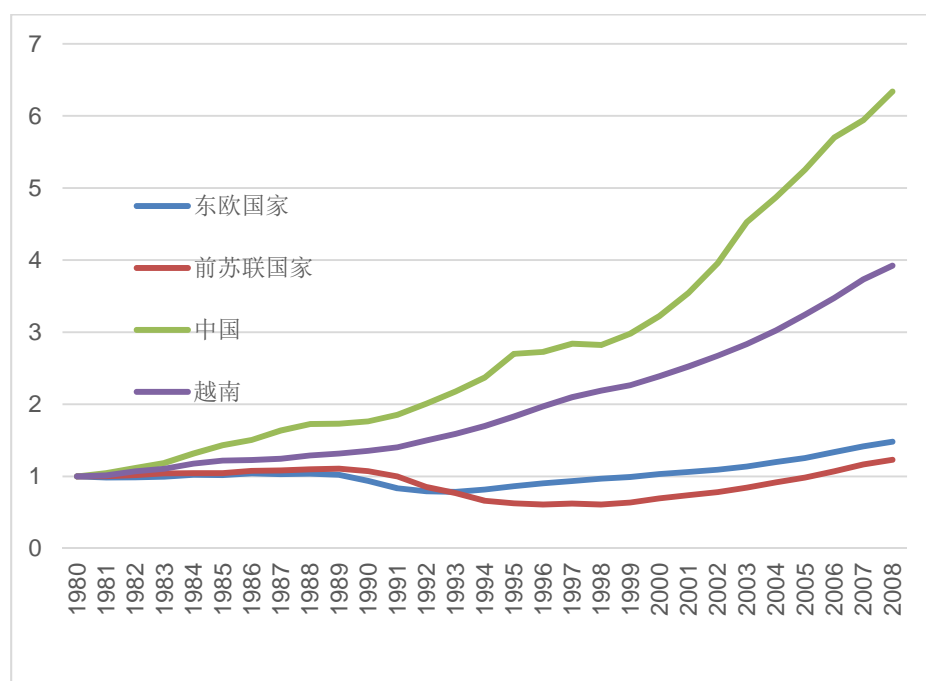


图 1：转型表现  
(1980 年人均 GDP=1)

这种东亚和东欧及前苏联国家在转型结果上的差异是经济学家意想不到的。众所周知，经济学专业对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正如萨默斯（Summers, 1994, 第 252-3 页）所说，在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改革时，主流经济学家有了一个惊人的共识：那就是采用基于华盛顿共识<sup>2</sup>的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是 Williamson (1989) 创造的一个术语，最初指的是为遭受危机打击的拉丁美洲国家所提供的一揽子政策方案<sup>3</sup>。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思想是消除政府的干预和扭曲，以创造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高效、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所实施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休克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版本。

休克疗法中的一个组成要素是快速的私有化。其支撑论点如下：私人所有权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需要一个真正的私营部门（Sachs 和 Lipton, 1990）；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大多数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的私有化来改善（Sachs, 1992）；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重组之前进行（Blanchard 等, 1991）<sup>4</sup>。另一个早期的关于转型的共识是，需要一个全面的、大爆炸式的价格放开。Murphy (1992) 等人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将 1990-1991 年前苏联产出的下降归因于部分的价格放开。他们认为双轨定价制度鼓励套利、腐败、寻租，并且将稀缺资源投入到更低价值产品的生产中。休克疗法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收紧政府的财政纪律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使价格起到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并且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批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之一。在 1978 年至 1990 年的 12 年间，中国的转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9.0%，贸易额每年增长 15.4%。这一时期中，每年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为 5.9%，而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以每年 9.9% 的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增长（国家统计局, 2002 年第 17 页, 94, 148）。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差距有所缩小。然而，中国并没有采用休克疗法，而是在转轨时期采用了渐进式的方法。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没有私有化；双轨制普遍存在，国家的计划与市场一起在资源

---

<sup>2</sup>当然，一些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Stiglitz 是一个典型。在他的书“*Wither Socialism?*”中，Stiglitz (1994) 质疑了“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和其他基本原则的可取性。根据信息不对称的理论，Stiglitz 认为，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在一系列文章中，Dewatripont 和 Roland (1992a 和 b, 1995) 因为考虑到转型过程中输家的不确定性和赔偿成本，也赞成渐进式改革。

<sup>3</sup>Williamson 的定义中的一揽子政策包括财政纪律，将公共支出从不加区分的补贴转向广泛提供促进增长、减贫服务、扩大税基、利率自由化、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统一关税、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市场准入、对金融机构进行谨慎监督和对产权的法律保护。在 Williamson 创造了这个词之后，“华盛顿共识”一词被用来指一种强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方式，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尽管 Williamson 本人反对这个更广泛的定义。在本文中“华盛顿共识”是指第二个，一般性的定义。为了反映转型的经验，John Williamson 提出了一个更为细微的定义，其中纳入了本文的许多批评（Williamson 2005）。

<sup>4</sup>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在转型中采用逐步的、渐进的私有化方法。例如，Kornai (1990) 认为，私人财产权不能通过法律就在转型经济中发挥作用，在这些经济中，整个世代被迫忘记与私人所有权和私人权利相关的公民原则和价值观，这种法律仅在表面上对有着最精致的法律体系和商业形式的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模仿而已。不过，Kornai 认为，私人所有权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的基础，私有化是消除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唯一途径。

配置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转型有幸拥有非常有利的初始条件<sup>5</sup>，但双轨制将很快导致效率损失、寻租和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Balcerowicz, 1994; Woo, 1993; Sachs 和 Woo, 1994 和 2000; Qian 和 Xu, 1993）。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声称：中国经济在转型中的双轨制方法尽管取得了最初的成功，最终将会导致经济灾难性的崩溃（Murphy, Schleifer 和 Vishny, 1992; Sachs, Woo 和 Yang, 2000）<sup>6</sup>。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承受住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东亚金融危机和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对其迅速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还使其国内平均生产总值从 1979–1990 年的 9.0% 增长到了 1991–2012 年的 10.3%（NSB 2013, Lin 2012b）。

相比之下，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前苏联经济体的转型都持乐观态度，因为它们的变化遵循了主流经济学家推崇的休克疗法（Lipton 和 Sachs, 1990; Blanchard, Dornbusch, Krugman, Layard 和 Summers, 1991; Boycko, Shleifer 和 Vishny, 1995）。推荐使用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也同样知道，从一个经济体系到另一个经济体系的转型需要时间，并且将既得利益放在一边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然而，他们乐观地预测经济会在休克疗法导致的最初的下降之后的六个月或一年内开始出现增长（Brada 和 King, 1991; Kornai, 1990; Lipton 和 Sachs, 1990; Wiles, 1995）。根据他们的论点，前苏联国家很快会跑赢中国，尽管前者的改革实施的更晚一些。然而，这样的预测从未成为现实<sup>7</sup>。

在转型后的最初十年中，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每年 163%，而乌克兰的通货膨胀率在 1991–2000 年达到了每年 244%。中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累计产量下降了 22.6%，独联体国家的产量下降了 50.5%。俄罗斯 200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 1990 年的 64%，而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经济体波兰，与 1990 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 44%<sup>8</sup>。同时，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中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 1987–1990 年的 0.23 增加到 1996–1998 年的 0.33，独联体国家的基尼系数从 0.28 增加到了 0.46（世界银行，2002）。总的来说，正如 Campos 和 Coricelli（2002）所总结：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在改革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

<sup>5</sup>被认为有利于中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包括：高比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低社会保障补贴、大量的海外华人和有助于实现一些短期目标的，相对分散的经济形式。

<sup>6</sup>还有一些经济学家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他们包括：Jefferson 和 Rawski（1995），McKinnon（1994），MacMillan 和 Naughton（1992），Naughton（1995），Singh（1991），Harrold（1992），Perkins（1988），Murrell 和 Xu（1993）和 Lau, Qian 和 Roland（2000）

<sup>7</sup>Dell'Anna 和 Villa（2013）发现，转型时期的改革与经济成长的同步速度系数为负，但长期内在前苏联国家这一系数为正。然而，中国和越南的增长的表现超过了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转型国家。

<sup>8</sup>波兰的经济记录是前苏联国家中最好的。然而，波兰并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虽然波兰的价格是自由化的，但其大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私有化（世界银行，1996；Dabrowski, 2001）。

表现在七个典型事实上，分别为：产出下降、资本收缩、劳动力转移、贸易方向转变、结构改变、制度崩溃和转轨成本增加<sup>9</sup>。

尽管中国在转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却对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未来的表现并不看好？许多参与前苏联改革的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的前沿工作，并且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大师，他们为什么不能预测和解释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带来的困境？与此同时，为什么他们对中国的转型方式表示悲观？因此，重新思考现有的经济转型理论是必要的。在本文中，我将提供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来解释为什么使用“华盛顿共识”作为经济转型的政策框架并不合适。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思想；第三部分定义了自生能力的概念，指出转型经济体中的大多数企业事实上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因为它们的政府在转型之前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政府的干预和扭曲是内生于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的需要。第四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华盛顿共识”改革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中国的双轨制渐进式改革实现了转型时期的稳定和快速增长。第五部分建议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纳入自生能力的概念作为全文的总结。

## 二、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在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随着时间改变而变化的原因<sup>10</sup>（Lin, 2011, 2012a）。它源于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和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连续变化的过程的观察，这一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进而使一个经济体中的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一个经济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使得这一经济体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具有最大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内生于其比较优势，而其比较优势又是由该经济体给定的禀赋结构决定的<sup>11</sup>。试图以不断地向现有产业增加有形资本或劳动力来推动增长的经济体最终将出现收益递减；试图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体的表现将会欠佳，这是因为这将使新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

---

<sup>9</sup>Kornai（2006）认为，东欧地区政治和经济制度转型是成功的，但他也承认，相当一部分人在转型过程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sup>10</sup>根据现代经济学的惯例，这种方法的研究应该被称为结构经济学。添加了“新”一词，以区分这些研究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波发展思想的浪潮，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地区。

<sup>11</sup>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要求一个国家的国内产业满足以下四个条件：（i）他们集中使用这个国家丰富和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ii）他们的产品有大的国内市场；（iii）每个产业形成一个集群；和（iv），每个产业的国内市场是竞争的（波特 1990）。竞争优势的第一个条件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只有一个产业与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一致时，第三和第四条件才会成立。因此，四个条件可以简化为两个独立条件：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规模。在这两个独立条件中，比较优势更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产业是该国的比较优势，该产业的产品在全球具有竞争力，并将拥有一个全球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最富有的国家是很小的（林和任 2007）。

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它们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扭曲和市场干预对其进行补贴和保护才能生存（Lin 2009）。

由于任何给定时间内的最优产业结构都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的，一个试图取得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国家必须首先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推动其产业结构偏离由其以前水平确定的最优水平，为了保持市场的竞争力，企业就需要相应地对其产业和技术进行升级。

如果一个经济体在其产业发展中遵循比较优势，其产业将具有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因此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sup>12</sup>。因此，他们将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并产生最大可能的盈余，资本投资也将获得最大的回报。因此，家庭将具有最高的储蓄倾向，从而导致了这个国家禀赋结构更快的升级。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如果能够遵循比较优势，也可以在升级过程中从后发优势中受益，并且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中获得与其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和技术创新，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的差距。

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经济能够以与其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方式增长。大多数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取决于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企业通常是根据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用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因此，企业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遵循比较优势的先决条件是：具有一套能够反映各种生产要素在禀赋结构中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这种相对价格体系只存在于竞争性市场体系中。通常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完善市场制度以创造和保护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有效竞争。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企业需要有关于生产技术和产品市场的信息。如果信息不是免费提供的，每个企业需要投入资源来对它进行收集和分析。尝试进入新兴产业的先行者可能会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他们瞄准了错误的产业；也可能会成功，成功是因为这一产业与国家的新的比较优势一致。如果成功，他们成功的经验可以为其他潜在进入者提供有价值的、免费的信息。由于新进入者的竞争先行者不能获得垄断租金。此外，这些先行者通常需要投入资源来培训工人，让他们了解新的业务流程和技术，这些受过培训的工人可能会被竞争对手雇佣。即使在先行者失败的情况下，他们的经验也能够向其它企业提供有用的知识，然而，他们必须承担失败的代价。换句话说，先行者的投资产生的社会价值通常比它们的私人价值大得多，而且先行者成功获得的收益和失败的成本之间并不对称。一个经济体中成功的产业升级还需要新型金融、法律和其他“软”（或无形）和“硬”（或有形）的基础设施来促进生产和市场交易，并使经济达到其生产可能

---

<sup>12</sup>比较优势最初用于分析各国的行业间贸易。今天的大量贸易是内部行业。然而，如果我们使用生产活动作为观察单位，比较优势也适用于行业内贸易的分析。

性边界。改进硬和软的基础设施或协调相关企业来进行完善超出个别企业的能力范围。

因此，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外部性并需要协调的动态过程。尽管在每个特定发展阶段市场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但在经济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因势利导作用。他们必须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具体包括：（i）提供与经济禀赋结构变化所确定的新的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的信息；（ii）协调相关产业的投资和对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改进；（iii）在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过程中补贴具有外部性的活动；（iv）通过孵化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克服社会资本和其他无形限制的缺陷以助推新产业的发展。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由三个方面构成：承认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因为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最优产业结构有所不同；在任何特定发展阶段市场对资源配置都起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过程中需要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新结构经济学能给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为何成功提供解释。

### 三、自生能力、发展战略和转型经济体的内生性扭曲

发展中国家禀赋结构的关键特征是：自然资源或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富，人力和物质资本相对稀缺。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原理，拥有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但人力和物质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竞争性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和（或）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相对丰裕、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被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占主流的结构主义发展思潮都建议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Lin 2011）。这种发展战略本质上是一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Lin 2003, 2009）。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下，那些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备自生能力。即使它们有良好的经营管理能力，也赚不到社会可接受的利润<sup>13</sup>。除非政府提供补贴和（或）保护，否则没有人会去投资或继续经营这些企业。因此，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不是结构主义所声称的市场失灵的缘故，而是因为公开竞争市场中的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sup>14</sup>。

---

<sup>13</sup>有许多因素可能影响企业的自生能力。在本文以及我的其他作品中，我使用“无自生能力”这一术语来描述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无法获得社会可接受的利润，因为他们所在的行业和技术的选择违反了比较优势。

<sup>14</sup>基于规模收益递增假设的理论模型，如 Krugman（1981, 1987, 1991）和 Matsuyama（1991），以及基于投资协调的理论模型，如 Murphy et al（1989），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结构是相同的，因此，一旦政府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摆脱差的均衡陷阱后，企业将在一个不存在扭曲的、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这种模型适合于讨论政府在帮助企业与其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的企业间竞争时的作用。然

为了实施赶超战略，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补贴许多无自生能力的企业。由于征税能力有限，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通过垄断、压制利率<sup>15</sup>、高估国内货币和降低原材料价格，给予赶超产业中的无自生能力的企业补贴和保护。这种干预不可避免地导致资金、外汇和原材料的普遍短缺。因此，政府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将资源直接分配给这些企业，这些手段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计划以及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信贷配给、投资和准入许可<sup>16</sup>。

采取了上述行政措施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建立起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赶超产业，然而会出现严重的信息问题。政府不可能确定必要的保护和补贴数额。当企业遭受损失时，即使是由于管理不善或道德风险问题造成的损失，企业会将责任归咎于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保护和补贴。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将以此作为借口，要求更多的保护和补贴，最终导致了软预算约束问题（Lin 和 Tan, 1999）<sup>17</sup>和寻租行为（Krueger, 1974）。为了减少寻租的激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进行了国有化（林，蔡和李 2001，林和李 2008）。

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专利保护和禁运，还会使赶超战略让发展中国家未能受益于后发优势。由于有限的可用资本、资源被优先用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更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其发展受到压制。由于整体经济表现不佳，开展昂贵的和风险大的本国的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能力将受到限制。几年后，这些曾经一度是先进的产业会变成过时，因此，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很快地扩大。

赶超战略也会影响收入分配。在消除了资本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直接的政府投资实现对优先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通过行政措施抑制工资率，并使其均等化，但这种平等是人为的。在其它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收入分配是两极分化的（Lin 和 Chen, 2007； Lin 和 Liu 2008）。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富人和（或）裙带资本家才有能力向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这些人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有机会获得低价的银行贷款和财政资源。对优先产业的补贴无论通过直接或间接税收来进行，实际上均是取自于那些无法对优先产业进行投资的相对贫穷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赶超策略不可避免地使收入分配两极化。同时，由于优先发展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它们只能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而那

---

而，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禀赋结构不同，这种模式不适合作为试图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的政策框架。在政府的帮助下，发展中国家可能能够在具有规模经济的先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将企业建立起来，然而，由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稀缺，发展中国的生产成本将高于发达国家。然而，这些企业在不存在扭曲的、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仍然是不具备自生能力的。因此，政府需要在企业建成后不断地给予补贴和保护。

<sup>15</sup>McKinnon（1973）和 Shaw（1973）讨论的金融抑制是这一战略的结果。

<sup>16</sup>过度的监管和行政控制将导致许多私人活动逃到非正规部门（de Soto, 1987）。

<sup>17</sup>“软预算约束”是由 Kornai（1986）创造的一个术语，它在 Dewatripont 和 Maskin（1995）的文章之后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主题。Kornai 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家长制的结果；Dewatripont 和 Maskin 认为，它是一种内生现象，源自时间不一致问题。在 Lin 和 Tan（1999）和 Lin 和 Li（2008）中，我认为软预算约束来自于施加给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些可能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缺乏资本而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大量劳动者或者滞留在农村或者处于失业或半就业状态，因此，工资率受到压制。所以，即使开始时实现了投资带动的快速增长，穷人也不会从增长中获益（Lal 和 Myint, 1996）。

总而言之，虽然通过赶超战略可以在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些先进工业，但它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分配效率低下、工作激励受到抑制、寻租行为猖獗、收入分配恶化和经济不景气。最后，采用赶超战略不仅不会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相反，差距会越来越大<sup>18</sup>。于是，拙劣的经济表现推动了改革，推动了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由于社会主义和转型经济中现存的许多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所有存在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假设，因此不适用于解决社会主义和转型经济中的问题。在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时，如果政府不愿意或不能够让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根据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消除扭曲和改革制度安排，很可能会使这种制度安排从次优（second best）沦为第三优（third best）。因此，最好的结果是改革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最坏的结果则是使情况更为恶化。

#### 四、自生能力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改革会引起前苏联国家和许多其它发展中国家中的转型经济体出现经济衰退、停滞和频繁的危机？问题并不出在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的目标上，而是没有认识到转型前经济体系中扭曲的内生性本质。

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目标是消除政府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扭曲和干预，并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体系。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市场的竞争机制将决定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价格将反映它们在要素禀赋上的相对稀缺性。有了这些价格，市场竞争将促使企业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因此，经济将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并繁荣发展。

然而，转型经济中存在许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没有政府保护和补贴，这些企业无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生存。如果只存在有限数量的没有自生能力的

---

<sup>18</sup>在 Olson (1982), Acemoglu et al (2001, 2002, 2005), Grossman 和 Helpman (1996 和 2001) 和 Engerman 和 Sokoloff (1997) 的模型中，政府干预，制度扭曲和寻租起源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控制。逻辑上，他们的模型可以解释一些观察到的干预和扭曲，例如进口配额、税收补贴和准入条例等。然而，他们的理论不能解释其他重要的干预和扭曲的存在，例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公有制企业，这违背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Lin (2009) 的附录 I 为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一组看似不相关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扭曲和干预提供了一个正式模型，这一模式主要基于政府推行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与给定的禀赋结构间的冲突所引致的对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扶持的需要。但是，一旦政府引入了扭曲，即使扭曲是为了崇高目的而创造的，也会创造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关于既得利益的论证可能适合于解释消除扭曲所遇到的困难。

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值和就业则是有限的，立即消除所有政府干预的休克疗法可能会适用，随着政府保护和补贴的取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将会破产。然而，最初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蓬勃发展，这些产业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带来的利益可能超过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带来的损失。因此，经济可以在实施休克疗法后很快实现充满活力的增长，最多也只有最初的一小部分损失。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很大，那么这些企业的产值和就业将占国民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此时，休克疗法带来的大规模的破产和失业率的急剧增加很可能导致经济的混乱。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或为了国防安全或自豪感而保持这些“先进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则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对这些企业进行保护和补贴。这些保护和补贴往往是以比以前的“扭曲”更加伪装的形式出现：将以前的次优的扭曲改变为甚至更差的第三或第四优的扭曲。即使将企业私有化了，软预算约束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因为私人所有者有更大的动机去游说补贴和保护，对无自生能力企业的补贴甚至可能会增加（林和李，2008）。实际上，这正是在俄罗斯和东欧及前苏联的许多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Brada, 1996; Frydman et al., 1996; Lavigne, 1995; Pleskovic, 1994; Stark, 1996; Sun, Bank, 2002）。最后，这样的经济体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有休克但没有疗法”的尴尬局面（Kolodko, 2000, Galbraith, 2002）<sup>19</sup>。

面对内生性的扭曲和经济中存在大规模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中国政府采取的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优于休克疗法（McKinnon, 1993, Lau, Qian 和 Roland 2000）。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取消“华盛顿共识”建议中的所有补贴，而是采取措施来改善对农民和国有企业工人的激励，同时保留对赶超产业中国有企业的转型补贴；采用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制度取代集体农业制度<sup>20</sup>，允许国有企业保留利润和经营自主权<sup>21</sup>，使农民和工人有机会获得部分的剩余。这种改革大大提高了农业和工业部门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水平（Grove 等，1994；Jefferson 等，1992；Jefferson 和 Rawski, 1995；Lin, 1992；Li, 1997；

---

<sup>19</sup>没有自生能力企业在经济中比重的差异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 Sachs 推荐的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成功，而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体中却没有成功。玻利维亚是一个贫穷的小型经济体；因此，政府可动员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资源很少，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对较小。Stiglitz (1998) 质疑“华盛顿共识”的普遍适用性，因其使用一小套政策工具：包括宏观经济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相对狭窄的经济增长目标。他鼓励各国政府使用更广泛的手段，例如金融法规和竞争政策来实现更广泛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等。Stiglitz 的论点基于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讨论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问题，以及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对转型路径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sup>20</sup>1978 年底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最初提议提高农业采购价格、放开农村集贸市场、缩小 20-30 户的生产队规模成为自愿组建的 3-5 户农户的生产组，但明确禁止以单个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系统替代集体生产。然而，安徽凤阳县一个贫困村的生产队在 1978 年秋季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到 1979 年时产量大幅上升，致使政府改变了政策，转而支持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农业体系作为农业制度改革的新方向（Lin 1992）。最初，集体土地只可以承包给农户一到三年，1985 年延长到 15 年，1994 年进一步延长到 30 年。直到 90 年代末，农民家庭有责任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向政府提供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以履行其配额义务。

<sup>21</sup>国企改革起始于 1979 年的利润留成制度，还包括 1986 年的合同责任制和 1990 年代到现在的现代企业制度。每一个制度首先会进行试点，然后才在全国推广（Lin 2012b, Lin, Cai 和 Li 2001）。

Weitzman 和 Xu, 1994)。然后政府允许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TVEs)<sup>22</sup>、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利用他们手中的资源去投资曾经被压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政府要求农民和国有企业履行义务，以规定的价格向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品。前者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后者确保了政府有能力继续补贴没有自生能力企业。因此，经济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

最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减少，国有企业的补贴需求减少，政府逐渐消除了价格扭曲和行政分配，并且私有化了那些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中小型国有企业（Lin 2012b; Naughton 1995; Nolan 1995; Qian 2003）。尽管没有大规模的私有化，尽管集体所有制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模糊不清，但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经济效益得到了显著提高（Li 1996; Lin, Cai 和 Li, 1998）。

越南的转型战略与中国的转型战略相似。通过这种谨慎和渐进的方法，中国和越南已经能够用市场体系取代传统的苏联型体系，同时保持了稳定和实现了快速增长。

顺便提一下，毛里求斯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也采取了双轨制的方式，来开放原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体系。它设立了出口加工区，鼓励出口，并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进口竞争部门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一改革战略使 1973 年至 1999 年期间毛里求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每年 5.9% 的增长——这是非洲地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Rodrik, 1999; Subramanian 和 Roy, 2003 年）。

然而，双轨制能否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取决于是否能够消除传统部门中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Lin 2012b）。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凡的增长，中国经济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过度集中于企业部门、外部失衡和腐败泛滥等。这些问题中有许多是双轨制改革的结果，双轨制改革保留了某些扭曲，这些扭曲是向赶超产业中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支持的一种方式。残留的扭曲主要包括：金融服务集中于四大国有银行、接近于零的自然资源开发税、以及主要的服务业包括电信、电力和银行业的垄断。

这些扭曲有助于中国转型时期的稳定，但也造成了经济中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其他不平衡的上升。这是因为只有大企业和富人才能获得来自于大银行提供的低利率信贷。结果是，大企业和富人获得的补贴实际上是来自于未能获得银行信贷服务并且相对贫穷的储户。大企业利润和财富的集中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不可避免。以超低价格使用自然资源和服务业的垄断具有类似的效果。富人和大企

---

<sup>22</sup>乡镇企业（TVE）是中国农民在转型过程中的另一个制度创新。在“包产到户”的改革之后，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剩余，并在消费品部门看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然而，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私营企业的形式被禁止，农民使用集体乡镇企业作为替代抓住了这次获利机会。政府最初对乡镇企业的运营施加了很多限制，担心乡镇企业会与国有企业竞争信贷、资源和市场。直到政府确信乡镇企业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并且能够解决城市市场短缺之后，政府才为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开了绿灯（林，蔡和李 2003）。

业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向他们集中导致了过度储蓄和投资，导致了巨额贸易顺差。这些扭曲造成了租金、寻租和普遍的腐败。

因此，为实现向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必须要解决结构性的不平衡问题，消除金融、自然资源和服务业部门的剩余扭曲。而这种改革的前提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sup>23</sup>。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是资本短缺的低收入国家时，根据国有企业的产品特征，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可以通过四种不同的策略来解决（Lin, Cai 和 Li, 1998 和 2001）。第一类主要包括与国防相关的国有企业，尽管其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特征违背中国的比较优势，但其产出对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对于这类国有企业，直接的财政拨款对其生存来说是必要的，政府应直接监测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据合理预计，只有少数国有企业是属于这一类别的。第二类的国有企业仍然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但其产出并不涉及国家安全，而且它们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这类产业的例子是电信和汽车行业。对于这类国有企业，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换资本”的方法，从国际市场获得资本来消除国内禀赋结构对这些企业的自生能力的不利影响。实现这一目标有两种方式：一是鼓励国有企业在国际股票市场上市；二是与外国企业合资，直接获得外国技术和资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石油都采用了第一种方法，许多中国汽车制造商遵循的是第二种办法，即合资的方式。第三类国有企业的产品在国外的市场份额有限，因此这类国有企业不能采用“市场换资本”的方法。他们解决自生能力问题的方式是利用他们的管理能力，并将其生产转移到劳动密集型产品中，这些产品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也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这种方法中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是彩色电视制造商——长虹。这家企业过去生产的是老式军用雷达，在转向彩电生产之后，该公司已经占据了中国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大多数国有企业在人员管理方面具有优势，如果能让他们有机会将生产线转移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他们当中就会有許多可以变得具有自生能力。第四类企业主要包括缺乏管理能力的无自生能力的企业，也因此无法将其生产转移到新市场中，这些国有企业应该被允许破产。

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企业是否能够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获得可接受的利润则取决于企业的经验管理。企业的绩效将取决于企业治理、激励

---

<sup>23</sup>除了自生能力问题，中国国有企业还有另外一个社会负担问题。在经济转型之前，重工业的投资只能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政府对城市的就业负有责任，通常分配几个工人到一个工作岗位，导致国有企业劳动力的冗余。工人拿到的工资很低，只足够支付当时的消费。在转型之前，国有企业将所有收入都交还给政府，政府使用财政拨款来支付国有企业的工资，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和其他支出。因此，冗员和养老金支出不会构成国有企业的负担。改革后，国有企业开始对工人的工资和退休养老金负责。新成立的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处在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部门，他们不存在冗员和老工人的养老负担问题。我把由国有企业自生能力引起的“战略性负担”以及冗员和养老负担所带来的额外成本的“社会性负担”统称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只要这些“政策性负担”存在，政府就需对企业的损失负责，软预算约束就不会被消除（Lin 和 Tan, 1999）。中国对消除“社会性负担”的必要性和方式已有共识，因此，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战略性负担”的问题。

机制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确定的其他因素。在没有政策性负担时，政府将不再对企业的业绩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对国有企业实施保护的传统中央计划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sup>24</sup>

## 五、结语

在本文中，我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方式的华盛顿共识。文章我强调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是一个技术、产业和软硬基础设施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是由其禀赋结构差异决定的。只有当产业与由经济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时，这一产业中的企业才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是因为政府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使企业置身于违背其经济的比较优势的产业中。他们的生存需要政府的补贴和保护，这些保护和补贴通过价格扭曲、限制市场的竞争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分配各种资源来实现。这些干预造成的后果是：竞争不足、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寻租、收入分配不均和资源分配效率低下等，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危机。“华盛顿共识”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扭曲的内生性，为了提高市场的效率，建议各国政府将改革重点放在加强产权、改善公司治理和消除政府对资源分配的权利等方面。当一个经济体中的大多数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时，执行这种转型方式就像前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失去的二十年”那样，会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情况（Easterly, 2001; Lin 和 Liu 2004）。

由于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的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在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研究这些经济体中存在的问题时，必须放松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放松自生能力的假设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并有助于重新定义政府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作用。当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存在大量的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时，政府需要务实地设计其转型战略。政府还应该在市场经济中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个体企业克服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Lin 2009, 2011）。

在前苏联国家和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不再认为转型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个子领域（Sonin, 2013）。然而，转型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结构性问题（EBRD 2013），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和转型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的特征，

---

<sup>24</sup>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由于资本的迅速积累，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除了跟国防安全有关的少数资本极端密集的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现在已经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中国应该与时俱进地将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扭曲取消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少数仍不具比较优势的国防安全产业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直接给予补贴。

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转型经济学 (Pistor 2013)。新结构经济学为新的转型经济学提供了分析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1369 - 401.
-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A.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1231 - 94.
-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A. (2005).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 In P. Aghion and S. N.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ume 1, Part A*.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North-Holland), 385 - 472.
- Balcerowicz, Leszek (1994). Common Fallacies in the Debate o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Economic Policy*. 9: 16-50.
- Blanchard O., R. Dornbusch, , P. Krugman, , R. Layard, and L. Summers (1991).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oycko, Maxim,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5). *Privatizing Russi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arro, R. J. (1998).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 Country Empirical Stud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rada, J. C. (1996). 'Privatization Is Transition, Or Is It?'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 (2), 67 - 86.
- Brada, Josef C., and Arthur E. King (1991). Sequencing Measur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es to Capitalism: Is There a J-Curve for Economic Reform? *Research Paper Series # 13*, Washington, D.C.: Socialist Economies Reform Unit, World Bank.
- Campos, Nauro. F. and Fabrizio Coricelli (2002). Growth in Transition: What We Know, What We Don' t, and What We Shoul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3): 793-836.
- Dabrowski, Marek (2001). Ten Years of Polish Economic Transition, 1989-1999, in: Mario I. Blejer and Marko Skreb (eds.), *Transition: The First Deca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21-152.
- de Soto, H. (1987). *The Other Path*. New York: Harper & Row.
- Dell' Anno, R. and S. Villa, (2013). 'Growth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Big Bang versus Gradualism,' *Economics o Transitio*, 21 (3): 381-417.

- Dewatripont, M. and Maskin, E. (1995).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2, (4), 541 - 56.
- Dewatripont, M. and Roland, G. (1992a). “The Virtures of Gradualism and Legitimacy in the Transitio to Market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 102 (March), 291-300.
- Dewatripont, M. and Roland, G. (1992b). “Economic Reform and Dynamic Political Constrain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 (4), 703-30.
- Dewatripont, M. and Roland, G. (1995). “The Design of Reform Packages under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5), 1207-27.
-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 Engerman, S. L. and Sokoloff, K. L. (1997). ‘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In S. Haber (ed.), *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60-304.
-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07). *Lif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People’s Attitude and Experiences*.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13). *Transition Report 2013*,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Frydman, R., Gary, C. W. and Rapaczynski, A. (eds) (1996).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Volume 2: Insiders and the Stat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Galbraith, James K. (2002). Shock without Therapy, *The American Prospect* (online). 13: 2002 .
-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1996),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3, ( 2 ), 265-286.
-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2001).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 Groves, T., Hong, Y., McMillan, J. and Naughton, B. (1994). ‘Autonomy and Incentives in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1), 183 - 209.
- Harrold, Peter (1992). China’s Reform Experience to Date, *World Bank*

- Discussion Paper*, 180 . Washington, D.C. : the World Bank.
- Jefferson, G. and Rawski, T. (1995). ‘How Industrial Reform Worked in China: The Role of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29 - 56.
- Kolodko, Grzegorz W. (2000).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Helsinki, Finland: UNU/WIDER Studi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 Kornai, Janos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3-30.
- Kornai, Janos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 Kornai, Janos (2006).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 Success and Disappointment,’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4 (2): 207-244.
- Krueger, Ann O.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291-303.
- Krugman, P. (1981). ‘Trade, Accumul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 (2), 149 - 61.
- Krugman, P. (1987). ‘The Narrow Moving Band, the Dutch Disease, 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 Thatcher’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7, (1/2), 41 - 55.
- Krugman, P. (1991).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2), 651 - 67.
- Jefferson, G., Rawski, T. (1995). How Industrial Reform Worked in China: The Role of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129-56.
- Lal. D. and Myint, H.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avigne, Marie (1995).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 Lau, L., Qian, Y. and Roland, G. (2000), [Reform without losers :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 (1): 120-143.
- Li, D. D. (1996). ‘A Theory of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Non-state Sector’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 (1), 1 - 19.



- Li, W. (1997).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1980 - 89’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5), 1080 - 106.
- Lin, Justin Yifu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34-51.
- Justin Yifu Lin (2003).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3: 277-308.
- Lin, Justin Yifu (2011),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search Observer*, Vol. 26, No.2: 193-221.
- Lin, Justin Yifu (2012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Lin, Justin Yifu (2012b),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Justin Yifu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J.Y. and Chen, B.K. (2007). ‘Development Strategy,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Inequality’ .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manuscript).
- Li Lin, J.Y. and Li, Z.Y. (2008). ‘Policy Burden, Privatis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6: 90-102,.
- Lin, J. Y. and Liu, P. L. (2008). ‘Promot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y Achieving Equity and Efficiency Simultaneously i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Stage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5, nos. 1 -2, pp.34-574.
- Lin, Justin Yifu and Ruoen Ren (2007), “East Asian Miracle Debate Revisited” (in Chinese) *Jingji Yanjiu*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Vol. 42 (8): 4-12.
- 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 426-31.
- Lin, Justin Yifu, Cai Fang, and Li Zhou (2003). *China’ s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Press, First Chinese edition, 1994;First English edi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6; Japanese edition, Tokyo: Nihon Hyo Ron Sha, 1996; Korean edition, Seoul: Baeksan Press, 1996; Vietnamese edition, Ho Chi Minh City: Saigon Times, 1999; French edition, Paris: Economica, 2000;

revised Chinese edition: Chinese version,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Press, 1999; revised Korean edition, Seoul: Baeksan Press, 2000; Taiwanese edi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aipei, Lian Jing Press 2000 (with the titl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2000 ; Russian Version, Moscow: Far Eastern Institute Pres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1.

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 (2001). *China’s State-owned Firm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Lin, Justin Yifu , Fang Cai and Zhou Li (1998). Competition, Policy Burdens,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8: 422-7.

Lipton, David, and Sachs, Jeffrey (1990).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No. 2, pp. 293-341.

Matsuyama, K.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eterminacy of Equilibrium’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2), 616 - 50.

McKinnon, R. I. (1993).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cKinnon, R. I.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McKinnon, Ronald I (1994). Gradual versus Rapid Liberaliza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es: Financial Polici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 China and Russia Compared,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63-94.

McMillan, John, and Naughton, Barry (1992).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8: 130-143.

Murphy, Kevin M.,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1003-1026.

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

Murrell, Peter (1991). C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underp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59-76.

- Murrell, Peter (1992). Evolutionary and Radical Approaches to Economic Reform, *Economic Planning*. 25: 79–95.
- Naughton, Barry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lan, P. (1995).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eform of Stalinism: The Chinese Puzzle’ . In H. J. Chang and P. Nolan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London: Macmillan, 400–17.
- NBS (2002), *China Statistical Abstracts, 200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ress.
- NBS (2013), *China Statistical Abstracts, 200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ress.
- Olson, M. (1982).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erkins, Dwight H (1988). Reforming China’ s Economic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 601–45.
- Pistor, K. (2013). ‘Towards A New Transition Economics: Comments on Konstantin Sonin’ s “The En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 ,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1 (1): 11–16.
- Pleskovic, B. (1994). ‘Financial Policies in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24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Porter, Michael 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Rodrik, D. (1999), ‘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Collapses’ ,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 (4), 385–412.
- Qian, Y. Y. (2003).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 In D. Rodrik (ed.),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97 – 333.
- Qian, Yingyi and Xu, Chenggan (1993). Why China’ 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 135–70.
- Sachs, J. D. (1992).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Some Lessons from Eastern Europ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2), 43 – 8.
- Sachs, Jeffrey D. and Lipton, David (1990). Poland’ s Economic Reform, *Foreign Affairs*. 69: 47–66.
- 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 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2000).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4 (1), 1–50.
- Sachs, Jeffrey, W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 435–91.
- Sah, R. K. and Stiglitz, J. E. (1984). ‘The Economics of Price Scissor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 March, 125 – 38.
- Sah, R. K. and Stiglitz, J. E. (1987). ‘Price Scissor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2, (1), February, 109 – 34.
- Shaw, E. 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ngh, I.J. (1991).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s There a Professional Schizophrenia on Socialist Reform, *Research Paper Series*, 17. Washington, D.C.: Socialist Economies Reform Unit, World Bank.
- Sonin, K. (2013). ‘The En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Lessons for Future Reformers and Students of Reform,’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1 (1): 1–10.
- Stark, D. (1996). ‘Networks of Assets, Chains of Debt: Recombinant Property in Hungary’ . In R. Frydman, C. W. Gary and A. Rapaczynski (eds),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Volume 2: Insiders and the Stat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Stiglitz, J. E. (1994). *Whither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tiglitz, Joseph (1998).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IDER Annual Lecture 2*. Helsinki: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 Subramanian, A. and Roy, D. (2003). ‘Who Can Explain the Mauritian Miracle? Meade, Romer, Sachs, or Rodrik?’ . In D. Rodrik (ed.),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5 – 43.
- 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 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 Sun, L. X. (1997). ‘Emergence of Unorthodox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East Asia: An Alternative Transition Path’ . *Research for*

*Action*, No. 38, Helsinki: UNU/WIDER.

Weitzman, M. L. and Xu, C. G. (1994). 'Chines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 (2), 121 - 45.

Wiles, Peter (1995). Capitalist Triumphalism in the Eastern European Transition, in: Ha-Joon Chang and Peter Nolan,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46-77.

Williamson, J.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 In J.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illiamson, J. (2005). 'The Strange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7 (2): 195-206.

World Bank (1996),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o, Wing Thye (1993). The Art of Reforming Centrally-Planned Economies: Comparing China, Poland and Rus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Tradition of Centrally-Planned Economies in Pacific Asia, San Francisco: Asia Foundation in San Francisco.